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2.06.02

村干部不同领导方式对村民自治绩效的影响^{*}

杨 峻, 李会林

(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00)

摘 要:将村干部的领导方式分为权威型、民主型、放任型三种类型,从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分为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 4 个方面衡量村民自治绩效,根据对多个省份 16 个村庄的问卷调查,分析村干部领导方式对村民自治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权威型领导方式与社会绩效以及公民参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民主型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供给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因此,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我国农村治理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权威型的领导方式也有一定的适应性,而放任型的领导方式是不适用的。村干部应灵活运用权威型与民主型领导方法,避免放任型领导风格和方式。

关键词:村民自治绩效;村干部领导方式;农村治理;村级事务;权威型领导;民主型领导;放任型领导;领导情境

中图分类号:F320.3;C93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10-10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eading Methods of Village Cadres on Villagers' Autonomou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YANG Jun, LI Hui-lin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eading methods of village cadr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uch three kinds as authoritative type, democratic type and arbitrary type, and villagers' autonomou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can be measured from such four perspectives as economic performance,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cluding democratic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supply performance from public product and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from 16 villages in many provin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ing methods of village cadres on villagers' autonomou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uthoritative leading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the democratic leading method is obvious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economic performance, democratic management performance, civic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public supply performance, an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ther variants is not significant. Thus, democratic leading method of village cadres has universal resilience in China's villagers' autonomous management, authoritative leading method also has certain resilience but arbitrary leading method is not applicable. Thus, village

* 收稿日期:2012-09-26;修回日期:2012-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GL081)“基于社会资本视域的村民自治组织绩效研究”

作者简介:杨峻(1987—),女,山东新泰人;硕士研究生,在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学习,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会林(1988—),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在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学习,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cadres should agilely use authoritative type or democratic type of leading method but avoid arbitrary leading method.

Key words: villagers' autonomou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leading method of village cadres; rural autonomy; village affairs; authoritative leading method; democratic leading method; arbitrary leading method; leaders' situation

一、引言

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从1980年诞生于广西宜州合寨村起,已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从现状来看,各地农村的村民自治状况差异甚大,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大的村民自治效果差异?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村民自治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基础、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以及土地流转政策等方面进行分析。如,吴俊霞(2009)从经济因素、自治制度缺陷、法律制度的缺位、民主意识的淡薄以及种族和宗族势力研究山东某地区村民自治现状;聂应德(2010)研究了乡土观念与村民自治组织绩效的关系;郑晓华和杨国贤(2010)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探寻农业税减免政策对村民自治绩效的影响;也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农村精英外流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村干部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带头、核心作用,被称为农村的“当家人”,影响着村庄的整体发展和村庄治理的最终效果。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村干部在村庄管理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行为,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日益凸现。但学界鲜有以村干部领导方式为着眼点对村民自治绩效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费德勒提出了团队的工作绩效与领导者动机及情境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即费德勒权变模型。随着费德勒权变领导模型的提出,对领导情境的研究开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规范的方法告诉领导者该如何评价追随者,如何选择领导风格;另一方面,领导是一种灵活的方法,没有硬性的、万能的和一成不变的规则,它建议根据具体的情境采用适宜领导风格,以取得更好领导绩效。近年来,情境领导理论有了新的发展,Hay/McBer管理顾问公司和丹尼尔·戈尔曼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最成功的企业高级经理并非仅采取某一种领导风格,他们会在一周内采用多种领导风格,而且其领导方式或风格的转换妥帖自然而不留痕迹。“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掌

握的领导风格越丰富多彩,越能因时因事因势而行动,根据实际需要加以灵活切换和恰当运用,其领导活动就越见成效,领导能力和魅力就越强。”(马新建,2003)

领导是否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实际的作用?已有研究给出了肯定答案。Robert J. House于1988年通过实地研究与实验室研究论证了低层领导者对组织的影响,他指出,大量数据均表明,领导者对员工努力程度、适应变化能力、员工集体流动程度、缺勤率、组织中的个人表现、接受决策的程度、决策质量、追随者的数量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领导是极大地影响个体成员满意度以及企业绩效的潜在因素。Peters和Nancy(1985)提出,高层领导者是影响企业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1998年Robert J. House调查了167家公司20年的销售利润方差,结果显示有31%是由高层领导者的变化带来的(Lieberson et al,1972)。

上述理论与相关研究均表明领导行为会对组织绩效以及组织的生存、发展、衰落产生很大影响,而且有效的领导方式要区分不同的情境。因此,本文从村干部领导方式视角研究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的绩效,并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验证村干部不同领导方式是否会对村民自治的绩效产生影响,以期能拓展有关理论研究,并为改进村民自治实践、提升村民自治绩效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假设

关于村干部的领导方式,本文以卢因(Kurt Lewin)的三种领导方式理论为基础,划分为权威型、民主型、放任型三种领导方式。对村民自治绩效的衡量,本文主要参照郭正林(2005)、郑卫荣(2010)、黄祖辉和张栋梁(2008)对乡村治理绩效的研究,从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4个方面进行衡量。

1. 权威型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绩效

我国农村地区,组织化程度极低,且人均占地面积少,总体上并不富裕。在与有组织的企业、外界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原子化的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对原子化的、技术短缺、信息闭塞的农民来说,

要准确把握市场动态、敏锐地觉察自身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清晰地分析经济发展的瓶颈,是相当困难的。已有实践多次证明,要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但就目前而言,农民真正有自主选择的组织主要是村委会。作为农村“精英”的村干部运用他们的权利以及所掌握的资源,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经历作出决策,此时权威性的领导方式会以其效率以及强效发生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的权威型领导方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甚少,但是从农村经济的特点、广大农民的自身的状况来看,若强调民主决策,限于广大农民知识水平的限制,往往会造成决策质量低下,如果村民不同意决策,对他们的指挥就会失效,会造成决策无效率。据此提出假设 1:村干部权威型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

同时,结合权威型领导方式特点及村民自治中政治、社会以及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这 3 种任务情境,提出假设 2:村干部权威型领导方式与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显著负相关。

2. 民主型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绩效

从民主型领导者所具有的特质来看,此类型的领导者注意下属的参与,并进行公开的沟通,侧重民主协商与公开透明,因此民主型的领导方式往往能提高参与者的民主意识,满足参与者的自主需求,会产生较高的参与满意度,从而提高民主管理绩效。French 等(1960)指出,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满足了员工诸多的社会需求,如被承认的需求、被赏识的需求以及自主的需求,员工上述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会产生较高的参与满意度。安东尼也指出,民主型的领导能使下属更能接受决策,并愿意参与决策并积极执行。具体到农村治理的实践,提高民主管理水平以及广大农民的参与热情以及满意度需要村干部采用民主型的领导方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与政治绩效显著正相关。

现实中村干部被赋予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维护村级治安的重任,比如防止盗窃、打架、斗殴、调节民间纠纷。实践中,村民在遇到邻里纠纷或是困难时,多会向村干部寻求帮助,村干部亦发挥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和的职能。Anthony (1978)曾指出,民主型的领导方式使成员有机会合

作解决共同的问题,现实相同的目标,必然会增进成员之间彼此的了解,加强团队的认同,并促进协调,成员对组织有较高的认同度。科奇(L. Coch)和弗伦奇 1948 年在一家成衣工厂实地研究发现,采用民主型领导方式的团体内,工人与主管的相处良好,抱怨情况减少,离职情况大幅改善,整个团队的人际关系良好。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有助于在成员内部形成融洽的氛围,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较高,有益于培养组织气氛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与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

当前,无论是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效率都处于低水平状态(李明,2010),严重地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村来说,政府是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主要主体,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多寄希望于政府。但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是“自上而下”的供给,由政府垄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种类,广大的农民群众只是被动接受者。这种单方的供给机制,极容易导致供给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一方面会导致一些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农民真正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目前没有学者研究关于民主型领导方式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但是结合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现状,作为村级带头人的村干部,应采用民主型的领导方式,发挥其联系国家与农民群众的桥梁作用:听取民众的心声,深入的了解农民的需求,并向政府反映农民的心声,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5: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显著正相关。

此外,基于农村经济发展这一任务的特殊性,考虑到民主型领导方式的特点,本研究提出假设 6:村干部民主型的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显著负相关。

3. 放任型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绩效

徐勇(1997)指出由于村干部扮演者政府“代理人”与乡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这“双重角色”使得村干部的处境实为尴尬,以至于常常发生角色冲突,部分村干部出现角色失败,比如两头应付碌碌无为,或是辞官不干,或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得过且过,对村级事务不管不问,对村民的需求不重视,无规章、无要求,往往是“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吴毅(2002)提出了村干部“双重边缘化”的观点,他认为村干部处于政府体制与农民社会的边缘地带,既为两者所用,但却无法被两者真正地接纳,只能在夹缝中苟存。

具体到农村治理的现实,村干部采用放任型的领导方式,虽然很少关心村民生活或是村级事务,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是在村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一方面他们要完成上级政府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政策传达;另一方面也会管理一定的社区日常生活,如调解邻里纠纷、给村级老人发放年终慰问金,他们并不是对所用的事情都不管不问。由于放任型领导方式对下属的要求较高以及农村管理的特殊性,采用完全放任的领导方式不一定会带来高水平的村庄治理绩效。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采用放任型领导方式的村干部并不会提高村级治理绩效,村庄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提出以下假设7:村干部放任型领导方式对村民自治绩效无显著的影响。

三、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实证分析数据,将受访对象设定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问卷调查时间为2012年7月至2012年8月,调查地区包括山东、安徽、河南、浙江等多个省份的16个村庄。共发放问卷380份,收回321份,问卷回收率为84.47%;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实际有效问卷为304份,占总回收量的94.70%,占总发放量的80.00%。

本研究需要测量的所有变量全部用5级Likert量表测量:(1)权威型领导方式的定义与测量,综合Kurt(1939)、Ronald(1939)等人的定义,参考郑伯坝(2000)、张德伟(2001)、王新怡(2003)等人对家长式领导方式中的权威领导维度的研究,形成初始量表4个维度共7个题项;(2)民主型领导方式的定义与测量,依据White、Lippner等人的定义,基于民主型领导方式相关理论,初始量表包含5个维度8个题项;(3)放任型领导方式的定义与测量,依据White、Lippner等人的定义,根据三种领导方式理论中关于放任型领导方式的相关研究,结合本研究的目的与现实状况,初始量表包含3个维度5个题项;(4)村民自治绩效的定义与测量,将村民自治绩效

分为经济绩效、是政治绩效(分为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和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参照郭正林(2005)、郑卫荣(2010)、黄祖辉等(2008)对乡村治理绩效的研究,初始量表包含5个维度20个题项;(5)控制变量,农民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学历3个人口学特征。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1. Harman 单因素检验

由于本文的数据是同一来源,因此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主要分为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统计方法对共同方差进行检验和控制。Harman单因素检验的基本假设为:若方法变异大量存在,在进行因素分析时,要么分析出一个单独因子,要么一个公因子解释大部分变量变异;如果只分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可判定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Eby,1997)。

本文采用传统的做法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即将所有变量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结果KMO值为0.931,大于0.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将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未旋转因素分析结果可知,共提取了7个公因子,并没有出现上述判定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的情况。因此,本研究所得到的样本数据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在本文中,权威、民主、放任三种领导方式以及村民自治绩效是4个潜变量,需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行信效度检验。

(1)领导方式测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AMOS5.0软件,基于固定负荷法,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个别指标的信度评估主要是用来检验观察变项在其反应因子上的标准化负荷。如表1所示,单个项目的 R^2 均大于0.50,且每个项目对应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0.7,所有标准化系数皆有很高的显著水平,故单个测量条款的信度全部是可接受的,因此这20个指标可以作为3个潜在因子的测量指标。

因子信度用Cronbach α 信度和建构信度来衡量,Cronbach α 的值大于等于0.7,而C.R的接受值

为0.5即可。从表1中看出,3个潜在因子的Cronbach α 值均大于0.7, C. R 的值在0.752~0.967之间,均在0.5以上,这说明各潜在变量的测量表现出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均可接受。

对于收敛效率,如表1示,潜变量所属的因素

负荷均大于0.8,表明研究变量具有收敛效率;各潜变量提取的平均方差 AVE 在0.720~0.785之间,均在0.5以上,表明测量指标的解释力超过其误差方差,各变量的测量有足够的收敛效率。

表1 领导方式测量模型参数估计

潜变量	测量条款	标准化系数	t 值	R2	建构信度 C. R	Cronbach α	AVE
权威型领导	A1	0.882		0.778	0.958	0.958	0.766
	A2	0.887	22.205***	0.769			
	A3	0.898	23.454***	0.807			
	A4	0.887	22.761***	0.786			
	A5	0.867	21.686***	0.752			
	A6	0.878	22.250***	0.770			
	A7	0.832	19.942***	0.693			
民主型领导	B1	0.861		0.741	0.967	0.967	0.785
	B2	0.904	22.572***	0.816			
	B3	0.890	21.860***	0.792			
	B4	0.920	23.452***	0.846			
	B5	0.872	21.008***	0.761			
	B6	0.902	22.500***	0.814			
	B7	0.886	21.671***	0.785			
	B8	0.853	20.103***	0.727			
放任型领导	C1	0.822		0.676	0.752	0.928	0.720
	C2	0.857	17.993***	0.734			
	C3	0.820	16.861***	0.673			
	C4	0.862	18.158***	0.743			
	C5	0.881	18.777***	0.776			
拟合优度指数(效率分析): $\chi^2 = 448.859$ df = 167 P = 0.000							
χ^2/df	GFI	AGFI	NFI	IFI	CFI	RMSEA	
2.688	0.863	0.828	0.935	0.958	0.958	0.075	

注:未行 t 值为参照指标,是限制估计参数;***表示 $P < 0.001$ 。

对于区分效率,本研究主要通过比较 AVE 平方根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评价。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潜变量的 AVE 平方根(对角线上的数据)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这表明特定潜变量因子解释与之对应的测量项目的变异量远大于其对其他测量项目的变异量解释,故满足区分效率的评价,模型具有区分效率。

表2 领导方式测量模型区分效率检验

	权威	民主	放任
权威	(0.875)		
民主	-0.859	(0.866)	
放任	-0.267	-0.060	(0.848)

注:对角线上数据为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的平方根,其他数据为各个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2)村民自治绩效测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运用 AMOS5.0 软件,基于固定负荷法,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如表 3 所示,单个项目的 R^2 均大于 0.50,且每个项目对应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 0.7,所有的标准化系数皆有很高的显著水平,故单个测量条款的信度都可接受,因此这 20 个指标可作 5 个潜在因子的测量指标。5 个潜在因子的 Cronbach α 值均大于 0.7,建构信度在 0.898~0.947 之间,均在 0.5 以上,这说明各潜在变量的测量表现出良好地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都可接受。潜变量所属的因素负荷均大于 0.8,显示研究变量具有收敛效度,并且,各潜变量提取的平均方差 AVE 在 0.687~0.857 之间,均在 0.5 以上,表明测量指标的解释力超过其误差方差,各变量的测量有足够的收敛效度。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潜变量的 AVE 平方根(对

角线上的数据)均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特定潜变量因子解释与之对应的测量项目的变异量远大于其对其他测量项目的变异量解释,满足区分效度的评价,模型具有区分效度。

3. 基于结构方程的假设检验

(1)理论模型检验

本研究运用 AMOS5.0 软件,对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参数进行评估(表 5)。从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和绝对拟合指标来看,RMSEA = 0.063 小于 0.08 的最高上限, GFI = 0.777、AGFI = 0.746 均小于 0.9;从相对拟合指标上看,CFI = 0.931、IFI = 0.932 超过 0.9 的最低标准,NFI = 0.882,接近 0.9 的标准。因此总体上看,理论模型基本上符合要求。为了探讨是不是存在拟合度更好的模型,本研究对相关的模型进行比较。

表 3 村民自治绩效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

潜变量	测量条款	标准化系数	t 值	R2	建构信度	Cronbach a	AVE
经济绩效	Eco1	0.829		0.687	0.940	0.942	0.726
	Eco2	0.810	17.074***	0.656			
	Eco3	0.719	14.372***	0.517			
	Eco4	0.931	21.530***	0.868			
	Eco5	0.920	21.081***	0.847			
	Eco6	0.884	19.670***	0.781			
民主管理	Pol1	0.958		0.917	0.947	0.945	0.857
	Pol2	0.954	34.891***	0.910			
	Pol3	0.862	25.206***	0.743			
公民参与	Pol4	0.893		0.798	0.947	0.947	0.857
	Pol5	0.954	27.408***	0.910			
	Pol6	0.929	25.933***	0.863			
社会绩效	Soc1	0.756		0.571	0.898	0.898	0.687
	Soc2	0.871	15.571***	0.758			
	Soc3	0.822	14.640***	0.675			
	Soc4	0.863	15.432***	0.745			
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	Pub1	0.848		0.720	0.929	0.928	0.766
	Pub2	0.871	19.534***	0.759			
	Pub3	0.892	20.336***	0.796			
	Pub4	0.889	20.210***	0.790			
拟合优度指数(效度分析): $\chi^2 = 519.066$ df = 160 P = 0.000							
χ^2/df	GFI	AGFI	NFI	IFI	CFI	RMSEA	
3.244	0.838	0.787	0.912	0.937	0.937	0.086	

注:未行 t 值为参照指标,是限制估计参数;***表示 $P < 0.001$ 。

表4 村民自治绩效测量模型区分效度检验

	经济绩效	民主管理	公民参与	社会绩效	公共产品供给
经济绩效	(0.852)				
民主管理	0.119	(0.925)			
公民参与	0.289	0.355	(0.925)		
社会绩效	0.301	0.465	0.465	(0.829)	
公共产品供给	0.225	0.346	0.362	0.515	(0.875)

注:对角线上数据为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的平方根,其他数据为各个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5 理论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间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S. E.	临界比 C. R. 值	显著性概率 P
权威领导→经济绩效	0.320	0.136	1.792	0.073
权威领导→民主管理绩效	0.209	0.136	1.462	0.144
权威领导→公民参与绩效	0.502	0.143	2.974	**
权威领导→社会绩效	0.589	0.103	3.483	***
权威领导→公共供给绩效	0.423	0.146	2.466	*
民主领导→经济绩效	0.431	0.135	2.510	*
民主领导→民主管理绩效	0.836	0.136	6.020	***
民主领导→公民参与绩效	0.857	0.143	5.245	***
民主领导→社会绩效	0.941	0.106	6.002	***
民主领导→公共供给绩效	0.785	0.146	4.715	***
放任领导→经济绩效	-0.035	0.088	-0.415	0.678
放任领导→民主管理绩效	0.074	0.088	1.094	0.274
放任领导→公民参与绩效	0.119	0.093	1.495	0.135
放任领导→社会绩效	0.090	0.066	1.139	0.225
放任领导→公共供给绩效	0.130	0.095	1.601	0.109
$\chi^2 = 1592.384$	df = 722	$\chi^2/df = 2.206$	RMSEA = 0.063	
GFI = 0.777	AGFI = 0.746	CFI = 0.931	IFI = 0.932	NFI = 0.882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2)模型修正

初始的理论模型,模型适配度的检验卡方值 = 1592.384,显著性概率 $p = 0.000 < 0.05$,达到显著水平,拒绝虚无假设,表示观察的数据所导出的方差协方差 S 矩阵与假设模型导出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相等假设无法获得支持,模型还需进一步修正。本研究对理论模型的修正主要是采用参照 AMOS 提供的修正指标 (Modification indices) 数据进行判别。

增列残差变量 F4 与残差变量 F5 间共变关系,

得到修正模型一;在修正一模型的基础上,增列误差变量 E22 与误差变量 E23 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二;在修正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列误差变量 E21 与误差变量 E22 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三;在修正模型三的基础上,增列误差变量 E21 与误差变量 E23 间的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四。

由表 6 可知,修正模型四各项拟合指标较好:从绝对拟合指标上看,RMSEA = 0.053 小于 0.08 的最高上限,GFI = 0.817、AGFI = 0.791 也均小于 0.9,相对于其他模型较好;从相对拟合指标上来看,CFI

=0.952、IFI=0.953、NFI=0.902 超过 0.9 的最低标准。总体上看,修正模型四符合要求,假设模型与观察数据基本能适配。因此,用修正模型四作为最终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见表 7,可得出以下结论:

权威型领导方式与社会绩效以及公民参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民主型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供给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表 6 各种结构方程模型比较

模型	χ^2/df	GFI	AGFI	CFI	IFI	NFI	RMSEA
初始模型	2.206	0.777	0.746	0.931	0.932	0.882	0.063
修正模型一	2.158	0.783	0.753	0.934	0.935	0.885	0.062
修正模型二	2.078	0.797	0.769	0.939	0.939	0.889	0.062
修正模型三	1.941	0.808	0.781	0.947	0.947	0.897	0.056
修正模型四	1.844	0.817	0.791	0.952	0.953	0.902	0.053

表 7 最终结构方程的分析结果

变量间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S. E.	临界比 C. R. 值	显著性概率 P
权威领导→经济绩效	0.274	0.126	1.548	0.122
权威领导→民主管理绩效	0.175	0.134	1.244	0.213
权威领导→公民参与绩效	0.425	0.141	2.556	*
权威领导→社会绩效	0.466	0.101	2.804	**
权威领导→公共供给绩效	0.274	0.144	1.616	0.106
民主领导→经济绩效	0.369	0.124	2.166	*
民主领导→民主管理绩效	0.804	0.134	5.872	***
民主领导→公民参与绩效	0.784	0.141	4.868	***
民主领导→社会绩效	0.892	0.104	5.415	***
民主领导→公共供给绩效	0.642	0.144	3.902	***
放任领导→经济绩效	-0.032	0.082	-0.379	0.705
放任领导→民主管理绩效	0.062	0.088	0.924	0.355
放任领导→公民参与绩效	0.091	0.092	1.155	0.248
放任领导→社会绩效	0.045	0.066	0.578	0.563
放任领导→公共供给绩效	0.079	0.094	0.969	0.332
$\chi^2 = 1323.672$ $df = 718$ $\chi^2/df = 1.844$ $RMSEA = 0.053$				
GFI = 0.817 AGFI = 0.791 CFI = 0.952 IFI = 0.953 NFI = 0.902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五、讨论与建议

1. 村干部领导方式与农村经济绩效

调研分析表面,村干部权威型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无显著关系,而民主型领导方式与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所得结论与理论假设不符。究其原因可

能为以下两点:

其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既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实现农村经济发展,除了受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济基础这些因素影响外,更多地受到农民收入、农村生产性投资来源、农村生产性投资动力、技术条件、投资引诱、政府体制及国家政策等因

素的影响(孙敏荣,2004)。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即使权威型的村干部规划好村庄发展方向,果断决策也未必会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绩效。

其二,农民是农村建设的力量之源,发展农村经济,需动员全体村民的力量。农村经济发展是关乎村庄长远发展的大事,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农民表现出了较高的参与热情。此时,村干部充分发扬民主型领导风格,密切地联系农民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农民意愿,不仅可以完成工作目标,取得较高的工作效益,而且成员间关系融洽,工作积极性也高,富有自觉性以及创造性。村干部民主型的领导方式多会带来村民的配合以及高度的工作热情,这会对经济任务的完成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此时若采取权威型的领导方式,如郑伯勋(2000)所指出的,权威型领导与下属的一系列态度反映存在着负面的关联,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下属在团队中的表现,如下属的信任感、满意度。还有研究表明,权威型的领导影响到下属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组织公民行为和角色外行为,而团队成员的这些行为都同团队绩效关系密切(许金田,2004)。村干部的权威型领导行为可能会降低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以及满意感,因此可能会出现消极配合的情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庄发展的经济绩效。

2. 权威型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绩效

分析表明,村干部权威型领导方式对民主管理绩效、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没有显著负向影响关系,反而对它们有正向影响,尤其与公民参与绩效、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理论假设并未得到支持,但也表明权威型领导方式在目前农村还有一定的适应性。

一方面,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无论村民认为村干部采取何种领导方式,他们均对民主选举、村民会议以及群团组织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热情。因此权威型领导方式同样会带来高水平的公民参与绩效。

另一方面,事实上,在农村地区,多数农民受限于知识、信息等资源,他们多忙于生计,终日田间务农或长年外出打工,因此参与村级治理的能力有限。而村干部多为村里的“精英”,多为村里的经济能人或是技术能人,他们的文化水平整体上高于农村一般劳动力,他们的决定一般也会得到村民的

认同。

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处理村务时多采用权威型的领导方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村干部与群众还是接触平凡,交往密切,关系较为融洽的,不是绝对的脱离群众。这与实际调查所得到的信息是相一致的,大多数村民表示,关于村里重大事务,村干部多单独决定,但在日常生活中,干部与群众还是有较多接触,村民有事情多会找村干部解决,干群关系较为和谐。

3. 放任型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绩效

分析表明,村干部放任型领导方式对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四个方面的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放任型领导方式往往会造成工作失控、组织涣散,本研究研究结果也表明放任型领导方式不能提高村庄的治理水平。

放任型的领导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村级管理中是不适用的。采用放任型领导方式的村干部对村级事务不上心,对村民生活不关心,必要时才出面处理村级事务,人际关系淡薄。此种类型的领导控制能力很弱,需要成员具有较高的意愿与能力,往往对专业人员会收到不错的效果。但当前我国多数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不高,能力有限,很难在村级管理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在村级管理的各个方面发挥带头作用的“当家人”,放任型的领导风格和方式不适合当前的农村治理实践。

4. 村干部领导方式建议

分析表明,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对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我国农村治理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权威型的领导方式在农村还有一定的适应性,而放任型的领导方式在目前的村级管理中是不适用的。

(1) 村干部应灵活运用权威型与民主型领导方法

本研究证明,村干部民主型领导方式对村民自治的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权威型领导方式对这几个方面的正向影响虽不如民主型领导方式显著,但并非一无是处。在调查中,村民多表示,在

村庄遇到灾害的危急时刻,村干部高效率、果断的决策会将损失降到最小。因此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权威型的领导方式并非不可取,可以适时采取。

村干部作为村级带头人管理整个村庄,需要权威,明白地告诉人们能做和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其权威性决定了任务和决定的严肃性。村干部还须在工作、生活上给群众更多关心、尊重及鼓励,多听取群众意见,知晓群众想法,充分商讨后,再发挥其权威,果断迅速决策,保证达成最终共识。

(2)村干部应避免放任型领导风格和方式,关注村级事务、加强沟通

本文的研究假设、整体模型都支持村干部放任型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各个方面绩效之间无显著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放任型领导方式并不适用目前的村庄治理,因此村干部应该避免运用,应该重视与村民的沟通交流,多关心村级事务,以提高农村治理水平。

当然,领导风格和方式是应随着需求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赫西以及布兰查德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领导者的风格应该适应被领导者的成熟度,随着被领导者逐渐成熟,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应当做适应的调整。随着农民参与意识及能力的提高,村干部可以适当放权,促进农民自主管理,提高村民自治绩效。

参考文献:

樊景立,郑伯坝.2000.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J].本土心理学研究(13):56-60.

郭正林.2005.如何评估农村治理的制度绩效[J].中国行政管理(4):23-26.

黄祖辉,张栋梁.2008.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轴的新农村建设研究——基于1029位农村居民的调查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56-61.

李明.2010.中国农村政治发展与农村社会治理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11-15.

马新建.2003.给自己多准备几副球杆[J].企业管理(12):67-68.

孙敏荣.2004.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制约因素浅析[J].现代农业(12):37-39.

王新怡.2003.家长型领导、信任与员工效能[D].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67-70.

吴俊霞.2009.村民自治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某地区调研为基础[D].山东:山东大学:19-37.

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78-85.

许金田,胡秀华.2004.家长式领导与自制公民行为的关系:上下关系品质之中介效果[J].交大管理学报(2):78-82.

徐勇.1997.论中国农村“乡镇村治”治理[J].社会科学研究(5):33-37.

杨友友,聂应德.2010.乡土观念与村民自治组织绩效的关系[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235-236.

张德伟.2001.家长型领导与转化式领导在军事单位的比较研究[D].台湾:台湾中山大学:20-26.

郑伯坝,黄敏萍.2000.华人企业组织的领导: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J].中山管理评论(4):583-617.

郑晓华,杨国贤.2010.农业税费减免政策与村民自治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6):47-49.

郑卫荣.2010.基于农民满意度的浙江农村公共服务评价与优化[J].农业经济(7):15-17.

ANTHONY W P. 1978. 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Reading, Massachusetts [J]. Addison-Wesley,8:28-39.

EBY L T, DOBBINS G H. 1997. Collectivistic orientation in teams; an individual and group-level analysis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8:275-295.

FRENCH J R P, ISRAEL J, AS D. 1960. An Experiment in a Norwegian Factory: Interpersonal Dimensions in Decision-making, Human Relations,13:3-19.

LIEBERSON S, O'CONNOR J F. 1972.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Study of Large Corporation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7:117-130.

PETERS T, NANCY A. 1985. Passion for Excellence: The Leadership Differenc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56-78.

(编辑:夏冬)